

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生存镜像与职业变迁

唐芒果¹, 蔡仲林²

(1. 南京体育学院休闲体育系, 江苏 南京 210014; 2. 湖北大学体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兴衰是该时期武术发展轨迹与特征的历史观照。运用社会学的视角, 主要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 以武术从业者群体及其生活动为研究对象, 梳理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变迁脉络, 提炼其内在逻辑, 为当代武术发展提供历史镜鉴。主要结论: 1) 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活动呈现“生存挤压与社会低位”的总体特征, 该时期的武术发展呈现冷热交替与高低起伏的历史特征; 2) 其群体的职业流动呈现“官方→民间”的特点, 其群体的武术技能呈现“地位重要→地位冲击→地位挤压”的特点; 3) 其群体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 并带有一定的江湖文化色彩, 社会地位低下; 4) 官方和民间是其群体生活动的双重渠道, 也是武术传播的双重渠道, 应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力量推动当代武术的传播。

关键词: 武术; 从业者; 武科人员; 摔跤艺人; 民间拳师; 武医; 职业变迁

中图分类号: G852.0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12(2016)02-0035-06

Survival Mirror and Career Change of Wushu Practitioner Group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dern Times

TANG Mang-guo¹, CAI Zhong-lin²

(1. Department of Leisure Sports,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Jiangsu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Hubei China)

Abs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Wushu practitioners is the historical witness of Wushu's development track and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stage of modern tim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sociology, this paper combed change track of Wushu practitioner groups and their activity and extracted its inner logic 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d a historical reference to modern Wushu development. Main conclusions: 1) "Struggling to survive and low social status" is the overall activity feature of Wushu practitioner group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modern.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at that time displays hot and cold by turns and ups and downs; 2) "The official → the folk" is the feature of its occupational mobility. "Important → shock → extrusion" is the overall feature of group Wushu skills; 3) Their activiti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on the bottom of society, and has some street culture color. Their social status is very low; 4) Government and folk are their two-tier tracks for survive and Wushu dissemination.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ivil pow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Keywords: Wushu; practitioner; military martial people; wrestling artist; folk pugilist; doctor with proficient Wushu; career change

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兴衰浮沉诠释着该时期的武术发展特征。近代前期(文中主要指1840—1927年期间)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与瓦解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经受苦难和抗争探索的一段历史时期。该时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发生明显落差。其中,1840—1912年之前,武术从业者群体遍布军队、武棚、庙会 and 村落等,其群体活动呈现分散化的特点;

1912—1927年期间,武术从业者群体主要活跃在学校和军队等,其群体的社会活动呈现集中化的特点。文中对近代前期的界定与划分并非着意于武术史学的考据,而是突出该时期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探知期间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社会活动特点及其生存境遇。

本文运用社会学的视角,以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及其生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不同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变迁进行分析。本文

投稿日期:2014-09-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12BTY051)。

作者简介:唐芒果,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与休闲体育。

搜集、整理了大量与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活动有关的书籍、期刊等资料,其中在“中国期刊网”“方正”等全文数据库,以主题为检索项和以“近代、武术”“武科、武进士、武状元”“摔跤、天桥、善扑营”“武术、京剧”“武术、中医、武医”“武术、江湖、江湖文化”等关键词,设定时间为1990—2013年的论文进行模糊检索,后又进行手动检索与筛选,共检出与本选题相关的文章384篇。在此基础上,对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兴衰沉浮进行考察,寻找其特定历史时期内不同群体职业生涯的异同,探析其历史成因;并根据文献资料对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生存活动特点进行总结,考察并梳理出不同武术从业者群体的变迁脉络,进而提炼出近代前期武术发展的轨迹与特征。

1 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角色

在近代前期的抗争与探索中,中国人民经历了三元里人民抗英、新思潮的萌发、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重大历史运动。在这一历史宏大叙事背景下,武术从业者群体被卷入到历史变革的潮流中,并面对着前所未有的生活遭遇和生存选择。这一时期的武术从业者群体对于中西文化冲突产生剧烈反应,在被唤起民族意识的惊人力量驱动之下,甚或凭借刀枪棍棒面对西方殖民强盗的洋枪洋炮^[1]。这一时期的武术从业者群体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其群体成员混杂,他们大多属于“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2]群体,呈现出非单一性的社会角色。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职业角色在不断变幻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发生着变化。

此外,他们职业角色的变化还受到其他方面的社会影响,诸如武科的废止、镖局的兴衰、武学人士的设场教拳和武术社团的出现等。这些社会影响不仅促进了武术的发展,而且也改变了社会对武术从业者职业角色的认知。武科取士激励了众多的练武之人,武科的废止又使他们预期的职业角色出现巨大落差;镖局的兴起扩大了练武人群的规模和社会影响,镖局的衰落使众多镖师散落于民间设场授艺,他们的职业角色发生转换;云游的武学人士并非全部出于靠武技谋生的目的,他们所到之处授徒传艺进行的非谋生性质的活动在客观上扩大了社会影响,其职业地位与社会角色得到认同。总之,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的职业角色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变而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2 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流动

在近代前期复杂变幻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中,

武术从业者群体中出现了明显的职业流动现象。职业流动是指从业者职业变动的过程,或者是获得另一种新职业角色的过程,它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3]。引发其职业流动的原因主要有2个方面:1)从社会层面上看,主要有近代前期社会形态、社会经济、社会教育方面发生的变化等原因;2)从个人层面上看,有家庭、生活、经济等客观原因,也有技能素质、教育状况、知识水平等主观因素。期间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他们在社会动荡中发生着剧烈的职业分化,其核心职业技能面临着新的社会生态环境的挑战。众多武术从业者在叹息中脱离了“老行当”,他们面对新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价值取向,在经受社会剧烈变迁和心灵撞击中,无奈地做出顺应潮流的生存选择。

近代前期出现了“民间武术家向城市化移动”的一种现象^[4]。期间大批农民涌进城市谋生,众多各行各业的雇佣工人基于强身健体、练武自卫和休闲娱乐等不同需求在各自区域的“武馆”“武棚”内拜师学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许多民间拳师,包括不同拳种流派的武术传承人,转换职场,进城谋生,设场授徒,谋求发展。民间拳师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这一社会现象,其实质就是该时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一种职业流动现象。

3 武科人员军旅生涯的变迁

清代是武科的鼎盛时期,也是其衰亡的时期。1901年,武举制度的废止宣告民间习武人员进入传统官方职业渠道的终结。自此,传统武术在社会转型中由“辉煌”走向“寂寥”^[5]。众多的武秀才、武举人和武进士(本文以武科人员代称这类人群)在“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的改革呼声面临着新的职业选择。

3.1 武科人员传统生存方式的断裂 清末武科的废除标志着习武之人官方职业晋升之路的中断,习武之人在国家战争需要的层面上已无用武之地。清代的武科会试的次数多,且武科人员的规模大,按照当时的武进士授官例,武进士均应授予相应的官职。但由于武科录取人数多、官位少,新中武科人才很难立即就职,武科人员积压滞留现象突出。许多武科人员成为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他们有功名,有武艺,无所事事,有的甚至为害百姓,祸害一方^[6]。

清代武将的来源有世职、武举、行伍和纳级4种途径。世职大多数为荣誉性官职,为虚职,几乎不掌握实权;纳级是通过捐纳而获得武职,其职位一般较低,非主流途径;清代武职的主要来源是武举和行伍。在清代行伍是国家武职人员的最主要来源,而武举出

身的武职官员在人数上与行伍相比差距较大,在职业上也不能与行伍出身的将领相比。以武进士的职业发展为例,武进士的职业发展呈“中间大两头小”的特点,位于低级别职位和高级别职位的武进士都很少,武进士职业发展的层次集中在中高级职位。清代武进士的职业发展路径从实授官职开始逐级升迁,基本上遵循“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的线路。他们在3年任职期满并经兵部考核合格后,可晋升高一级别的职位。事实上,战事时在破阵、攻城、夺舟和招降中的军功是武将升迁的一个重要因素,老迈、死亡等也是影响武进士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清代武进士的职业生涯往往以任职期间死亡、休致、革职3种形式终结。任期内死亡,是清代武进士职业生涯终结的最常见方式,一部分武进士因错误或办事不利而被革职,也有一部分武进士到了规定年龄而退休即休致^[7]。

有研究表明,清末军人群体的经济地位居于或稍高于当时社会的一般水平^[8],由此可从侧面推知当时武科人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另外,清末社会上出现了知识分子投笔从戎的现象^[9]。伴随着新式武器和先进军事技术的输入,新式军事院校应运而生,开设了算术、几何、地理、天文、机械制造、航海和外语等课程,文人们有了用武之地,而武科人员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纷纷让位于新型的军事人员,军事武艺的核心地位被严重地边缘化,大量武科人员解甲归田,开始了民间的自由职业生活。

3.2 “天下武科最后一人”的集体记忆 武状元是全国武科举考试和殿试选拔出来的第一名。练武之人考取武进士被称为“跳龙门”,通过殿试被皇上点为武状元,则被世人称为“独占鳌头”,武状元是武科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自开武科的1200年以来,有案可查的共281名武状元,其中清代109人,为历史最多,有统计称,约每5年才出1名武状元,可谓凤毛麟角^{[10]13-14}。历代统治者为了笼络人才,感召天下练武之人,极其重视武状元。清代殿试后的武状元将立刻成为朝廷武官,将会获得正三品将领(参将、头等待卫等高级武官)。

然而,清代绝大多数武将的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却不为人们所看重,并形成了一种潜在的社会影响。非战争时期,待补缺的武科人员群体往往是人多而官位少,许多人“终老不得补”^{[10]14-30}。鸦片战争及以后系列战争的失利,致使武举滞后于时代的问题愈发突出,张之洞等人提出了武举改革方案。1898年,清政府下诏改革武科,一律改试枪炮,废除默试武经一场^[11]。自此,国家开始了新型军事人才的选拔与培养。新军的中下级长官一般由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或军事专业的留洋海归人员担任。武进士在“习洋枪、学西法”训练与装备

的新军中受到很大限制,很难融入作为主要国防力量的新军系统。武进士主要集中在绿营军系统,清末的绿营充其量是新军的备用军和补充。在这样背景下,武进士几无可能在战争中建功立业,也就很难获得升迁的机会,其职业生涯陷入停滞发展阶段。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下诏改革武科的同一年,张三甲成为了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武状元。张三甲(生卒年不祥),河北开州(今濮阳)人,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武举一甲第一名及第武状元,授职官为头等待卫。其榜眼为山东山阳人任联捷,探花为满洲镶白旗人苏克敦^{[10]430-433}。张三甲不仅成为“天下武科最后一人”,也成为天下练武之人凭借武艺正途求取功名的集体记忆。

4 民间拳师群体的生存镜像

4.1 摔跤艺人群体的生存空间 清末民初的民间摔跤艺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该群体的形成与清代散入民间的“布库”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善扑营”中的专职摔跤手被称为“布库”。清代前期布库的训练始终与战阵联系在一起,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布库的训练,后来才有了专门培养布库的“善扑营”机构。“善扑营”除管理与训练布库以外,还负责管理和训练“勇射”和“骗马”,“勇射”就是指专业的弓箭射手,“骗马”就是驯马或者训练骆驼的骑手。到了乾隆年间,布库训练军事武艺的成分逐渐减少,而娱乐表演的成分逐渐增加。清代末期“善扑营”的布库除日常训练和节日庆典专场表演以外,有时也会被派出加入到侍从行列承担保镖与护卫任务。随着清政府的衰亡,建制240多年的善扑营(1669—1911)解散,诸多布库开始散落民间。特别是民国以后,许多原善扑营的摔跤手靠圈场卖艺糊口,甚至还有一些摔跤手改行拉车维持生计^[12]。期间的摔跤手主要集中在北京的天桥、天津的三不管地带、济南的大观园、沈阳的北市场和南京的夫子庙等地。

民国十一年(1922),原善扑营布库杨双恩因生活所迫,在天桥设场卖艺,开始了他的摔跤卖艺生涯。翌年,民间摔跤高手沈三加入,自此,杨双恩与沈三在天桥创立了北京第一个职业表演摔跤的民间场所。他们技艺高超,表演绝妙,使得每天观众如流,一些善扑营的摔跤秘技开始流传于民间,天桥摔跤手群体的规模与影响随之而扩大。民国初期以来天桥的摔跤手群体前后达上百人^[13]。其中包括杨双恩、沈三、张狗子、宝三、徐俊清和满宝珍等最为著名的摔跤艺人。他们在长期的职业表演生涯中逐渐形成了各自的风格 and 特点,并为世人所称道。如沈三的摔跤表演特点

是跤法丰富,变幻莫测,实力超群,为当时北京的摔跤魁首;出身搬运工的张狗子身材健硕,为半路出家学艺,后经恩师杨双恩口传身授,张狗子技艺大增,在跤坛名列前茅,曾获旧中国全运会摔跤亚军(1936)等。当时的民间摔跤艺人群体主要有北平跤、保定跤、天津跤 3 大流派,每个流派均有许多以此生的摔跤手。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社会地位低微。他们通常使用艺名,其真实姓名鲜有人知。为了避免亲朋知道他们入了贱行,辱没家门,他们按照行业规矩使用艺名,别人只能称呼其艺名,成名之后亦是如此。如上述提到的沈三,原名沈友三;张狗子,原名张文三;宝三,原名宝善林等。

该时期的民间摔跤艺人群体在长期对抗演练实践中,吸取了汉、满、蒙等多民族的摔跤技艺,兼容并蓄众家所长,融会贯通各派技巧,并经过不断地扬弃,积累并形成了具有技术含量高、观赏性强、规则简明合理、安全文明等优点的“中国式摔跤”。有学者称“摔跤,一举一动都是文化”^[14]。中国式摔跤“以身体两脚之外第三点着地即为失分”与“点到为止”的竞技规则最能体现中西文化中“合和”与“竞技”思想的融合^[15]。时至今日,中国武术散打技术体系中的“快摔”仍是区别于世界其它武技的重要技术内容和特色。

4.2 民间拳师的京剧表演生涯 京剧演员与民间拳师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清末民初时期两者之间甚至出现过职业角色互换的现象。如著名京剧大师谭鑫培(1847—1917),文武双全,集唱功(老生的安工)、武打(靠把)、做功(衰派)为一身,为谭派开山鼻祖,也是京剧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谭鑫培因嗓子倒呛而无法上台表演,曾在丰润县史家做过一段时间的护院镖师。“传说武术大师甘凤池青年时代就曾在米家戏班教过武把子。”^[16]尽管武术与京剧武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武术的本质属性之一是“技击”,京剧武打的本质属性之一是“表演”。

另外,镖局镖师与京剧武生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京城武术蓬勃发展之时,也正值镖局行业生意兴隆之势。镖局是民间拳师栖身谋生、传授武术和显亲扬名的重要场所,镖局行业对京都武术乃至京剧武打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会友镖局的创办人大刀王五曾与“三庆班”的武生夏奎章切磋过武艺,并传为佳话;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洪春(1898—1990)在其回忆录《京剧长谈》中讲到,他出身武术世家,李洪春曾祖为鲁中道上著名镖客,后来随祖父流落北京。他后来转行做了程长庚“三庆班”的护院,并兼科班武术教师;北派武生创始人俞菊笙的台上武打都是真功夫,开打之后,剽悍异常;北派大师杨小楼,精研武术,从各派拳术中吸取武打艺术。杨小楼曾学过八卦掌、练

过通臂拳和六合枪,武打表演出神入化;南派武生代表盖叫天(1888—1971),青年时在苏州与杭州两地,曾拜师镖师刘四爷学习六合刀和三节棍等,即使在他成名之后,也曾多次向民间拳师请教武艺^[16]。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京剧武行的武打技艺脱胎于武术,之后发展成为一种程式化和虚拟化的武舞艺术形式。当代竞技武术中一些强烈的表演节奏和威武的亮相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汲取了京剧武打表演艺术的营养,这一切或许源于该时期京剧武生与民间拳师的角色互换与技艺交流。

4.3 民间拳师群体的武医之路 自古武医不分家。在传统医学中能够找到武术的身影^[17],武医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源于传统武术与传统医学之间的相互渗透与融合,另一方面源于古往今来民间拳师群体习武行医的社会影响与造诣。中国武术与传统医学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习武之人的禁欲原则、点穴术和擒拿法、武术健身理论、伤科等 4 个方面,其中,武术与伤科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拳起于易,理成于医”、“未练功,先学药”等武林谚语能从侧面反映武术与传统医学的关系。武术和伤科均与战争有密切关系。古战场双方厮杀,金属利器或钝器造成的创伤即“金疮”,应为伤科医师诊治,其诊治除用跌打膏药、夹板固定等手段以外,还需“按、摩、推、拿、搓、抄、滚、捻、缠、揉”等手法,甚至运用武医中特有的推拿手法,才能牵开错位,整复骨折,这些均表明武术与伤科存在着特殊关系;再如留存至今的“一指禅伤科推拿”就是传自少林寺的武医秘技^[18]。

近代前期民间拳师群体中就有诸多颇有造诣的伤科专家,他们除了自身习拳练武和中医养生之外,还热衷于践行武医之道,正骨疗伤,治病救人。如民间武术家高义盛(1866—1951)师承周玉祥八卦掌和形意拳,1911—1918 年期间会山东原籍传授八卦掌期间,还经营药铺,履行武医之道;著名武术家佟忠义(1879—1963)祖传摔跤和医术,1911 年曾任察哈尔骑兵第一团正骨科医生,1928 年,被聘为上海市国术馆少林门主任兼馆医;董俊(1882—1939)从父习医练武,1914 年师从李存义习形意拳后,于 1918 年返回原籍太原,先受聘于山西医院中医主任,随后又受聘于山西国术促进会武术教师;妙月和尚(1883—1945)师从觉明和尚以及林九如等,习练太祖拳法等,兼习跌打医术,他一生传授武艺、行医募捐等;期间还有一些武术家如王子平(1881—1973)、马凤图(1888—1973)、郑怀贤(1899—1982)等,他们武艺精湛,精通医学,新中国成立后以骨伤治疗为业^[19]。近代民间拳师兼习的伤科被称之为“跌打科”或“接骨匠”,其伤药被称为“武打膏药”,他们为伤科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的独有地位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该群

体当时所从事的伤科被称为不入流的“贱业”,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

4.4 民间拳师群体的江湖之道 民间拳师群体离不开“江湖”二字。他们总与“江湖好汉”“江湖义气”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话语相关。民间拳师与江湖人物一样均属于社会底层人士,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还充当某些江湖角色。古时的巫、医、百戏为江湖文化的源头,到了近代江湖社会的发展已基本成熟与定型。江湖人物,统称为“三教九流”,而江湖行当,则被称为“五花八门”^[20]。近代前期间拳师的职业活动具有流动性和秘密性的特点,他们的群体活动带有一定的江湖文化色彩。

武林社会如同江湖社会一样具有各自独特的群体文化内涵。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各自存在着的一套主流社会之外的规则,这些规则可能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和稀奇古怪的话语体系,但却拥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和独立的规范体系,使得武林中人和江湖中人行使各自的责任与义务。民间拳师群体为了能在江湖上立足,自觉形成各自的门户与流派,共同立下武林规矩,形成各自的团体力量,拥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民间拳师社会地位的边缘化,往往促使他们强化自身的保护意识,秘密且低调行事,做事很难让外人窥探,无形中捎带上些许神秘的色彩。所以,民间拳师群体经常与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商贩、运夫、水手、僧道和医卜等各类游民为伍。民间拳师群体中武术艺人主要有“流浪卖艺”和“厅堂演出”两种卖艺形式^[21]。其中多数以跑江湖卖艺为主要形式,他们在社会上被称之为“打把势卖艺的”,这是传统农业社会中民间拳师群体的重要生存方式之一。“李瓜二行”是指文武二艺,“李行”就是指变戏法,“瓜行”是指耍把式,包括古代“百戏”也被社会上统称为“走马卖解”。江湖上的“八门”是指“巾皮李挂”和“平团调柳”的八门。其中,挂门就是瓜门,是指耍枪弄棒、打把式卖艺等^[20]。民间拳师群体就与这“八门”有关。

江湖道义是民间拳师群体的信仰基础。他们信奉的道义和准则,能够形成类似于血缘关系的“义气”群体。他们在行走江湖中,能够做到不问亲疏,患难与共,异姓一家,不分贵贱,义胆侠骨。民间拳师与大多数江湖中人一样,多数为脱离劳动生产一线的特殊人群,凭借的自身谋生技艺,生活在非主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其职业活动蕴含着复杂的生存规则和道义,其中势必夹杂一些江湖文化的内容,如门规仪式、行当禁忌、职业称谓、江湖隐语等。不难看出,该时期民间拳师群体的职业活动,既具有草根性与神秘性的特点,也具有精华与糟粕并存的特点。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分析发现,近代前期武术从

业者群体从“官方(军队)→民间”的职业流动过程中,一些军旅武艺流传到民间,甚或一些秘而不宣的武技(如善扑营的摔跤)也散落到市井巷陌,无形中运用民间的力量推动了武术的传播,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影响力。因为“武术的实用价值,是由民间个体的格斗与大规模军事技能共同演变而来的”^[22]。同时,武术从业者群体在民间的职业活动中与“京剧演员”“伤科医师”“民间艺人”等“三教九流”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扩大了武术在不同行业之间的传播。另外,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职业流动扩大了其群体自身在其他行业中的活动范围,加速了武术的传播。

5 结束语

近代前期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社会活动呈现“生存挤压与社会低位”的总体特征,该时期的武术发展呈现冷热交替与高低起伏的特征。一方面,其群体的职业流动呈现“官方(军队)→民间”的特点,武术技能呈现“地位重要→地位冲击→地位挤压”的特点,另一方面,其群体活动主要集中在社会底层,并带有一定的江湖文化色彩,社会地位低下。就当代武术传播而言,本研究给予我们重要启示:武术从业者群体的生存活动渠道就是武术的传播渠道。官方和民间是武术从业者群体生存活动的双重渠道,也是武术传播的双重渠道。当代武术的发展与传播不能仅依靠于官方渠道,还要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推动武术的传播,发挥其重要的渠道作用。

参考文献:

- [1]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673-675.
- [2] 朱英,魏文享. 近代中国自由职业者群体与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3.
- [3] 苑茜,周冰,沈士仓,等. 现代劳动关系辞典[M]. 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181.
- [4] 林伯原. 中国近代前期武术家向城市的移动以及对武术流派分化的影响[J]. 体育文史,1996(3):14-16.
- [5] 洪浩,田文波. 辉煌与寂寥:传统武术的现代话语阐释[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3,36(9):26-32.
- [6] 许友根. 武举制度史略[M].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89-91.
- [7] 刘丹枫. 清代武进士仕途研究[D]. 沈阳:辽宁大学,2012:13-15,35-47.
- [8] 皮明勇. 晚清军人的经济状况初探[J]. 近代史研究,1995(1):14-35.
- [9] 逯慧娟. 投笔从戎: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走向解读[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02-105.

(下转第76页)

- sons for geriatric depression; an exploratory study[J]. *The Arts in Psychotherapy*, 2005, 33(2): 89-97.
- [6] Xia J, Grant TJ. Dance therapy for people with Schizophrenia[J]. *Schizophrenia Bulletin*, 2009, 35(4): 675-676.
- [7] Earhart GM. Dance as therapy for individuals with Parkinson disease[J]. *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d Medicine*, 2009, 45(2): 231-238.
- [8] Flores R. Dance for health; improving fitness in African American and Hispanic adolescents[J]. *Public Health Reports*, 2005, 110(2): 189-193.
- [9] Kim TH, Seo JH, Moon KH, *et al.* Application of Korean traditional dance to treat stress incontinence; possibility for being a complement and substitute for pelvic muscle exercises [C]//*European Urology Supplements*, 2009, 8(4): 211.
- [10] Calcutt S. Does SALSA dancing help improve your mood? [R/OL]. [2014-03-23] (2008-01-24). <http://www.sqa.org.uk/sqa/26146.html>.
- [11] Dubbert P. Physical activity and exercise; recent advances and current challenges[J].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000, 70(3): 526-536.
- [12] Thayer RE. Activation-deactivation adjective checklist: current overview and structural analysis[J]. *Psychological Reports*, 1986, 58(2): 607-614.
- [13] Verghese J, Lipton RB, Katz MJ, *et al.* Leisure activities and the risk of dementia in the elderly[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3, 348(25): 2508-2516.
- [14] Watson D, Clark LA.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A Tellegen[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8, 54(6): 1063-1070.
- [15] House RJ, Rizzo JR. Role conflict and ambiguity as critical variables in a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1972, 7(3): 467-505.
- [16] 马剑虹, 包蕾萍. 工作特征、控制感及职业紧张的关系研究[C]//中国心理学会. 第八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文摘选集, 1997.
- [17] 康钊. 广场集体舞蹈对老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1, 19(4): 417-419.
- [18] 李萍. 体育舞蹈对女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的影响[D]. 广东: 广州大学, 2012.
- [19] Hausenblas H, Brewer B, Van Raalte J. Self-presentation and exercise[J]. *Journal of Applied Sport Psychology*, 2004, 16: 3-18.
- [20] Lindgren A. The pioneering work of Franziska Boas at Bellevue Hospital in New York, 1939-1943[J]. *American Journal of Dance Therapy*, 2006, 28: 59-86.
- [21] Hart E, Leary M, Rejeski W. The measurement of social physique anxiety[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 1989, 11: 94-104.
- [22] Hanna JL. The power of dance: health and healing[J]. *Th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1995, 1(4): 323-331.
- [23] 朱磊, 张玲. 体育舞蹈选项课教学对女大学生 A 型行为的影响[J]. *科技信息*, 2010, 12: 267-268.
- [24] Ekkekakis P, Hall EE, Van Landuyt LM, *et al.* Walking in (affective) circles; can shortwalks enhance affect? [J]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00, 23(3): 245-275.
- [25] Sonnentag S, Jelden S. Job stressors and the pursuit of sport activities; a day-leve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09, 14(2): 165-181.

(上接第 39 页)

- [10] 王鸿鹏. 中国历代武状元[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2.
- [11] 张勇坚. 武科的存废与军事教育的近代化[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8(1): 103-108.
- [12] 金启琮, 凯和. 中国摔跤史[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155-159.
- [13] 成善卿. 清朝宫廷和民国天桥的攒跤活动[J]. *体育文史*, 1991(8): 21-25.
- [14] 薛永逸. 老北京杂吧地: 天桥的记忆与诠释[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 260-281.
- [15] 李全生, 苍海. 合和与竞争: 中国式摔跤“入奥”可行性分析[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6): 32-36.
- [16] 李勇明. 武术与京剧武生艺术[J]. *北京档案*, 2009(10): 51-52.
- [17] 袁金宝. 武术文化软实力的构成内涵及提升路径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5): 50-56.
- [18] 程大力, 王庆余. 论传统医学与武术的双向渗透[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1990(3): 12-19.
- [19] 中国武术大辞典编辑委员会. 中国武术大辞典[M].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0: 470-488.
- [20] 刘平. 近代江湖文化研究论纲[J]. *文史哲*, 2004(2): 68-75.
- [21] 傅起凤, 傅腾龙. 中国杂技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232-233.
- [22] 雷军蓉, 冯子天胤. 中国武术本体走向的迷失与价值变迁[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14, 37(6): 27-31.